



《在太行山上》这首歌穿越时空，永远年轻；《沂蒙山小调》历久弥新，长盛不衰；一个战争年代诞生的炮校文工团，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歌舞团的前身。这一切都与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高级将领，被称为“炮兵之父”的朱瑞有着重要联系。朱瑞不但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而且是重视战地文艺工作的典范。

朱瑞，190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1924年考入广州大学，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春，朱瑞回到上海，先后任中央军委参谋科参谋、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朱瑞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1939年后先后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等职。1948年10月1日，朱瑞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时年43岁。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

太行山剧团首次唱响抗战名曲《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一首荡气回肠的抗战老歌，80多年来一直唱响在祖国大地。《在太行山上》这首歌，出自1938年5月创建于山西晋城的八路军太行山剧团。这是一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文艺轻骑兵，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剧团创始人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太行山剧团在抗战时期，不但是一支抗日宣传队，同时又是一支工作队和战斗队。它的创建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建设和戏剧文化活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12月，朱瑞受中央军委派北上太行山，在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玉皇庙成立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训练所的话剧组和陵川县游击支队宣传队组成联合抗日流动剧团，经常在周围村庄上演抗日剧目，很受群众欢

重视战地文艺的“炮兵之父”朱瑞

□ 戚善成



朱瑞与毛泽东在延安时的合影



太行山剧团演出后演员合影



山东费县沂蒙山小调诞生地

迎。1938年4月，朱瑞在陵川县成立县儿童抗日宣传队。当月下旬，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晋城，联合抗日流动剧团回到晋城。此时，陵川县儿童抗日宣传队也到达晋城，与联合流动剧团会合。朱瑞决定将这两个文艺团体合并，组成一个剧团。

1938年5月4日这一天，太行山剧团在晋城成立。朱瑞到现场祝贺并致辞，他说：“五四”作为太行山剧团成立的日子，是要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太行山剧团的命名是很有意义的，意味着剧团应该像太行山一样雄伟坚强，永远和太行山军民一起战斗在太行山上。要为军队演出，要为群众演出，宣传动员一切力量起来抗日，争取最后的胜利！

朱瑞十分关心剧团的业务建设，鼓励文艺战士多演戏、演好戏，特别鼓励他们大胆创作太行人民喜闻乐见的节目，朱瑞还亲自为剧团编写过剧本。太行山剧团创办的7年中，排演了大量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这些剧目中既有古往今来广为流传的剧目，也有剧团同志根据当时当地现实生活，自己创作并流传至今的新剧，如《保卫抗日根据地》《太阳出来了》等。由洗星海作曲、桂涛声作词的著

名抗战经典歌曲《在太行山上》就是由太行山剧团首次在太行山根据地唱响的。

太行山剧团在极其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假造成为一支鼓舞和激励太行山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抗日宣传队，同时也为新中国革命的胜利，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军政文化人才。

山东抗日根据地诞生《沂蒙山小调》

现在家喻户晓的《沂蒙山小调》，是一首经典的山东民歌，诞生于山东费县薛庄镇白石屋村。它的前身是1940年由驻沂蒙山区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李林和阮若珊等人采集创作的《反对黄沙会》。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朱瑞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日寇经常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当地反动势力——黄沙会，与我抗日军民对抗。那年6月上旬，抗大一分校在沂蒙山区参加反顽战役。文工团成员借助当地的花鼓调编写了歌曲《反对黄沙会》。此歌在

反顽战役的政治攻势阶段，发挥了瓦解敌人、教育群众、鼓舞我军斗志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山东根据地在日军频繁“扫荡”的形势下，面临着环境动荡、物资紧缺、人员缺乏等种种困难。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新的政治任务的特点，朱瑞号召山东根据地党领导下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革命道理。当时，活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专业剧团，既有影响大、负有盛名的胶东国防剧团、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瀛南剧团，也有在各地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下组建起来的胶东孩子剧团、湖西流动剧社等一些地方文艺团体。正是这些文艺团体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文化大军，他们以文艺为武器，紧密配合我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宣传活动。

为了扩大影响，提升演艺水平，在朱瑞指示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教育处和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组织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山东纵队鲁艺宣传大队、省妇教会姊妹剧团、黎

明剧社等8大剧团，在鲁南根据地渊子崖村举行会演。演出了《回到前线去》《十八勇士》等10多个大小剧目。观众踊跃，盛况空前。此后至1942年间，这些活跃在各地区的文艺团体组织了多场联合演出，把山东抗日敌后戏剧运动推向了高潮。

各剧团、宣传队每到一地，就教唱抗战歌曲，排练演出节目。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有几百首之多，民歌《八路军》《沂蒙山小调》就是其中深受群众喜爱的名曲，唤醒和动员了千百万民众投身抗日。

解放战争中建立的朱瑞炮校文工团

今天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是由2016年1月军队改革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歌舞团演变而来的。说起原总政歌舞团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朱瑞炮兵学校文工团。

1945年6月党的七大闭幕后，中央曾决定要朱瑞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找他谈了话。但朱瑞认为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要求去做建设炮兵的工作。中央

说说五代时期的冯道

□ 段培华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他曾三入中书，在相位20余年，屡经丧君亡国而稳坐为官，可谓五代时著名的“不倒翁”。对于冯道，历来褒贬不一。其实，冯道只是五代大环境中的代表性人物。评价他，需明晰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他的个人境遇，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有失偏颇。

冯道名居高位，其实并无多大实权。在相位20余年，通常让人误说他位高权重。其实，冯道的“相位”，与通常所理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大不同。在中国古代，有个人宰相制，有集体宰相制，有三公坐而论道，也有宰臣“跪受机宜”。不同时期，宰相权力不可同日而语。汉初，宰相权力非常大。汉初宰相陈平曾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不过，治世看相、乱世看将。五代是著名的乱世，兵权主要掌握在中央的枢密使、禁军统帅，地方的各大镇节度使手中。后唐庄宗时的郭崇韬、后唐明宗时的安重海、后晋的桑维翰、后汉的史弘肇、后周的王峻，这些人冯道处于同一时代，他们的权势远非冯道可比。五代后汉的权臣史弘肇就曾说：安朝廷、定祸乱，有长枪长剑就足够了，至于什么毛锥子（指毛笔），又有什么用！对于文臣极其轻视。契丹南下灭后晋，冯道到京城朝见契丹君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问冯道为何来拜见，冯道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说的倒是实话，“无城无兵”的冯道只能去朝见契丹君主，“有城有兵”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则非但不朝见，反而伺机起兵反契丹，最后建立后汉。所以五代时有人说：“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

艰难。”在战乱的年代，冯道的实际影响力有限。

五代时，像冯道这样的廷臣比比皆是。五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短短53年间，已换了五个朝代，时人视政权更迭有如儿戏，历仕多朝是时人的常见选择。如符彦卿，本身乃后唐名将符存审之子，长期领兵，先后也仕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五朝，历任地方各大镇节度使，后封为魏王，到北宋时，仍然身居显要。《东都事略》称符氏“近代贵盛，无与为比”。比如五代时的侯益，同样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与符彦卿忠于职守不同的是，侯益反复无常。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曾说：“侯益貌顺朝廷，心怀拂贰。”《宋史》说，“侯益在晋、汉时，数为反覆，观其受命契丹，私交伪蜀，赤罔之战，复夜谒周祖，宗属长幼，遭景崇鲸鲵，殆无噍类，推其心迹，岂怀贰之罚欤？”即使这样屡屡通敌叛变的个人，他所效命的各个朝代非但没有将他治罪，反而让他安然活到北宋，宋初更是被当作元老对待。这些反常的情况都是由于五代特殊的环境决定的。五代是一个武将可以拥立皇帝的时代，后唐明宗、后唐末帝，甚至北宋赵匡胤都是被军中将士拥立。五代时，许多皇帝的军事力量都没有特别强大，因此对于臣属的约束力自然也就较弱，即使是叛将也并不都进行诛杀，君主有时甚至恳求部下不要造反，且许多五代君主本身就是前朝“叛逆”，也很难用忠君道德来约束臣下。所以一定程度上，在五代连仕数朝，是时势使然。冯道从没有权倾一时，也并无累累罪行，反而私德颇佳。《旧五代史》说，“（冯道）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平生甚廉俭”，《新五代史》言，“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



誉”。

总体看来，后世对冯道的赞誉、否定都不是简单地针对冯道个人，而是赞同、否定冯道所代表的价值观。赞誉他是理解他的处境，肯定他清廉、任事、忍辱负重等个人品质。否定他的，与其说是对冯道本人的批驳，不如说是对以冯道为代表的不能忠君的臣子的反对。因而，统一王朝的君主对冯道多不认可。宋真宗曾说：“冯道历事四朝十帝，依阿顺旨，以避灾难，为臣如此，不可以训也。”宋仁宗说：“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对于统一稳定的王朝来讲，冯道的“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极不可取，不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可见，评价冯道其人，宜据其所处历史情势，客观评述，庶几近于真实矣。



六合同风 四海一家

□ 程丽君

“六合同风”出自《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是西汉贤臣王吉在上疏汉宣帝时所言，他认为《春秋》推崇周天子君临天下的大一统局面，是因为周朝在尊重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教化，实现了全国上下政令贯通划一。关于“六合”，《庄子·齐物论》中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成玄英疏：“六合”为“天地四方”。“六合同风”意指通过推行教化，使天下之民形成共同的观念，都能够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中国历史上，圣明的君王往往以“修

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原则，推行教化，以实现“至治之世”，开创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如何实现“六合同风”？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中讲：“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古时候司徒作为执掌民事、邦教的官员，通过让民众修习“六礼”（冠、婚、丧、祭、乡饮酒和乡射礼）来节制民性，明辨“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来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通过整齐“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来防止奢侈浪费，推行道德教化来使社会上的风尚、礼节、习惯一致；通过赡养老人施行孝道促进社会上形成孝顺的风气，救济孤独来避免这部分人被社会遗弃；通过推崇贤者来发扬高尚的品德，去除品行不好的人来警示人们要改正错误。简而言之，实现“六合同风”就是要使天下礼仪、教化、政事相统一。

“四海一家”出自《荀子·议兵》“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意思是说“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遵从”。《尚书》上说：“爰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确立仁爱之心应该从对亲人的感情为开端来培养，最终达至爱天下人。《论语·学而》中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之心是为人之本。因为一个拥有孝悌之心的人，往往在家里能够做到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到外面能够通过推己及人，进而爱护他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就能够做到《论语》上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当通过教化把每个人的孝悌之心、仁爱之心培养起来，自然能够使得全国上下其乐融融，四海自是一家，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四海一家”的理想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与“六合同风，四海一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秦国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兵，以武力统一天下，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西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把孔子用以教授生徒的“六经”作为正统思想，在全国推行儒家文化，建立大学，讲授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成功实现了大一统，西汉王朝延续了几百年的统治。隋朝文帝结束了持续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并依靠儒家文化，实行以礼治国。他还施行招抚政策，被内附部族首领尊称为“圣人可汗”。唐朝时期，唐太宗盛赞孔子“以大圣之德，天纵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伦资其教义”，在全国提倡儒学。他还提出了“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思想，被四夷诸部首领尊称为“天可汗”。元朝时期，忽必烈取儒家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元”字，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他通过推行“汉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明朝时期，统治者推崇“华夷一家”，明太祖朱元璋向天下宣称“四海之内，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他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尤其注重道德教化。清朝时期，顺治帝遵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帝崇儒重道，颁布《圣训十六条》，提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历代王朝实现大一统的强盛局面，与统治者强化以儒治国，倡导“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儒家文化是分不开的，这也为中华民族始终具有惊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